

绪 论

战后日本哲学是近代日本哲学的承续和发展，是日本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战后日本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哲学思想亦获得相应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因此，探索和研究战后日本哲学，无疑是现代日本哲学研究之首要的并且是重要的课题。

一、战后日本哲学形成与展开的社会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社会混乱，经济枯萎，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然而，经过短短十年的努力，日本就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政治上完成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制定并实施了战后新宪法，经济上逐渐摆脱对于美援和“特需”的依赖，加入并适应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日本经济的独立。在1955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日本正式提出重新推进战前未完成的现代化。从此，战后复兴期结束，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被纳入现代化的轨道。60年代，日本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在动荡中追求平衡和稳定。经济开始腾飞，出现前所未有的持续的高速增长，至1973年，国民人均收入达到2964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西德。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以说，70年代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以欧美文明为目标的现代化终于实现的时代。

70年代是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期。所谓转折是说日本也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意味着经济重心将从依赖生产工业物品转向服务、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并且通过扩大“内需”以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进而人们的要求、价值观和阶层、阶级的结构也都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着。譬如国民的就业结构呈现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率持续上升趋势，至1980年已达55.4%，国民的消费生活和余暇生活均呈现信息化、知识集约化的倾向；教育上扩大了义务教育后的教育，高中和大学的升学率逐年提高；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断提高自动化程度和信息处理技术水平。至80年代初期，日本大体完成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日本在80年代提出国际化的目标，即要“对国际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政治大国”地位，为此，日本在继续维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又开始把视线折回亚洲，重新认识亚洲的价值，重视中日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为适应这种国际化政策的需要，日本想通过追溯日本文化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化历史说明日本不仅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且也具有与欧美异质的独创性文化传统，从而树立文化国家的形象。同时，日本还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和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资助国际日本学研究者开展日本文化研究，以向海外弘扬日本文化。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这一期间日本哲学的展开，提供了十分广阔、深刻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哲学的出发点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带来了日本历史的转变，自然也带来了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转变。那么战后日本哲学从什么基点出发，向什么方向转变呢？

战败唤起日本学术界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以往日本学术研究的整个状况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提出了近代日本哲学中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主要缺欠。一是哲学研究存在着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实践的倾向。这一点在学院派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学院派哲学在日本哲学界占居主流地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深居简出，追求学问的超然性，不去积极地研究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提出的课题。显然，远离社会实践，偏执于自我内省所获得的只能是“主客相没物我相忘”的“纯粹经验”，创立的只能是富有东方色彩的非理性主义思辨哲学。二是依存于西方哲学的非独立性。日本近代哲学不是在自身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明治初期以启蒙思想家西周等人导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为契机产生的。对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问题，对于东方及日本的精神传统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等问题没能充分地加以考察批判地予以继承。三是面对战前日本社会思想的日益反动化，当时大多数学者及其学问没能展开充分的批判和斗争，有的甚至由妥协进而为之作理论论证。通过反省，日本哲学家认识到脱离社会实践，单纯依附于西方哲学而不去挖掘和发展根植于日本精神土壤的传统思想，是日本哲学和哲学家对于法西斯主义，对于侵略战争缺乏有力的批判和斗争的根本原因。

这些反省既不能说是无益的，也不能说是充分的。这些反省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日本近代哲学存在的问题。这既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近代哲学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认识，又包含着反省者面向未来，试图克服过去的缺欠和弱点，开拓新的发展道

路的积极愿望。但我们认为这些反省仍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日本现代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这种矛盾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因此，脱离对近代日本社会及其制度的分析，单纯进行哲学反省是不可能深刻认识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的。

三、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分期

在日本学术界对“战后”一词的规定并不明确。一般说来，从狭义上使用“战后”这一用语时，是指1945年战败至70年代末这一期间；从广义上使用“战后”这一用语时，上限同是始于1945年战败，却无确切的下限限定。本书采用广义上的“战后”涵义，即把战后日本哲学思想一直写到80年代末，亦即昭和时代终结为止。从这一规定出发，我们把哲学纳入到战后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背景中来看，其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5年战败至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从而为哲学研究中的学术自由提供了政治保证。于是战前一度曾被取缔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登上理论舞台，并以主体性争论推动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活跃展开。另外，实存主义在战后日本也找到了存在的精神土壤，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亦涌进了日本。

第二个时期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这是日本经济在复苏之后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1955年，日本学术界重新提出日本文化研究问题，不久，岩波书店出版了《现代思想》（17卷）丛书。60年代，岩波讲座《哲学》（18卷）丛书、筑摩书房的《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等各类数十卷本的大型丛书相继问世，哲学社会科学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第三个时期是从70年代开始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日本

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80年代，日本政府在国际化口号下，采取积极对策，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经济上的富足，政治上的民主化趋向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为哲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战后成长的一些著名哲学家接踵出版个人著作集，标志其创造性的哲学体系雏型的形成，有的研究甚至达到了国际水平。

四、战后日本哲学的展开

在上述各个时期，日本哲学的展开不论在形式与内容上，还是在成熟度上，都有所不同。从总体态势上看，第一、二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存主义哲学为主流，在种种形式上表现出对立的扬弃，通过扬弃，不久又衍生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等，各流派间既相互吸取、又保持其原本形态；进入第三时期，特别是80年代则表现出活跃的创造性意欲。

1. 战后第一个时期。占居哲学界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战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1946年结成全国性学术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创办《理论》季刊，翌年又建立了“唯物论研究所”，发行《唯物论研究》。虽说当时日本的大多数哲学家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倾向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当时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由列宁、斯大林代表的思想，即使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也是经过斯大林时代的重新解释而体系化了的替代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不满足于对经典的训诂注释，而是结合日本的现实问题展开理论思索。他们在建构民主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引发一场关于主体性的争论。主体性论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以梅本克己和真下信一为代表，另一类以田中吉六和三浦勉为代表。梅本认为，主体性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焦点。唯物主义

在实践上虽然重视主体（人），但在理论上却不予重视以至使之“闲置”起来。马克思主义如不填补唯物主义留下的这块理论“空隙”就会不断成为唯心主义的温床。梅本建议唯物主义应该通过批判地摄取实存哲学和西田、田边哲学中的“无”的逻辑得到充实，三者取长补短，结合起来就是“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哲学”。以松村一人为代表的“民科”主流派哲学家撰文批判梅本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肯定物质的决定性的同时，总是强调意识的能动性，总是重视主体在认识客体、改造客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本不存在梅本所说的理论“空隙”。另外，田中吉六立足于武谷三男的技术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主体性理论。总之，关于主体性的争论虽然存在着理论讨论并不充分的缺欠，但其影响颇大，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还有寺泽恒信的《辩证逻辑学试论》（1957）、城塚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1955，改订版题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田边振太郎的《自然辩证法研究》（1949）以及三浦勉和黑田宽一的研究等。

实存主义哲学是战后初期日本哲学界又一大思潮，它以对抗马克思主义或者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姿态出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心。这一时期，日本哲学界着重于实存主义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即翻译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大师的原著。截止1955年，在不到10年之间，克尔凯郭尔、萨特的全集、选集或专著几乎都被译成日文出版。随着日文译著的出版，关于他们的评介、研究论著也接踵问世。有的以实存哲学为线索，探讨哲学的现代课题；有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试图推进实存哲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由于美军的占领，美国哲学思潮、尤其是实用主义也涌入日本，但作为哲学派别，它仅在“思想的科学研究会”会员中有一定的影响。

2. 战后第二个时期。此间，在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其理论研究。一是与前一时期相比，把视线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转向西欧的哲学思想，开始导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了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阿尔杜塞、沙夫、科西克等人的思想。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实证的、多角度的研究。论者通过对初期马克思异化论的再探讨，试图确立与展开人论研究，同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研究，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松涉的业绩，他在其一系列研究著作中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文献学研究开始，因为自 3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献有许多被歪曲，必须通过考证加以纠正。基于这一认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种版本及马、恩的手稿进行考证，重新编辑了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广松版”。不论在结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解析上，“广松版”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成为日本大踏步提高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水平的契机。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探讨。其中芝田进午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船山信一在《人学唯物论的立场和体系》（1971）中提出了人学唯物主义，藤野涉的《历史唯物论与伦理学》（1971）和栗田贤三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与价值》（1976）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论和价值论展开开拓性研究；柳田谦十郎对唯物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古在由重等主编的《讲座·马克思主义哲学》（5 卷本，1969）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

就现象学而言，战前已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了初步介绍和研究，战后第一个时期从实存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海德格尔和萨特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日本真正的现象学研究，乃始于

第二个时期。6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复兴胡塞尔”的呼声，现象学研究因之活跃起来。以立松弘孝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翻译胡塞尔的重要著作梅洛-庞蒂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作为研究著作新田义弘率先出版《何谓现象学》（1968），该书的刊行，使生活世界、地平线、被动性、生命存在、主体间性、身体性、显现命题、根底等主要概念在日本现象学论著中确定下来。随之，渡边二郎、辻村公一、田岛节夫、木田元等也在现象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今天，在日本现象学研究者中间，既依据胡塞尔，又超越胡塞尔，摸索现象学新的可能性的尝试，正在以各种形式展开。

分析哲学在战后初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进入60年代后则更加活跃。但是，此间的所谓分析哲学，在日本主要表现为“科学哲学”即运用逻辑符号对科学语言的意义论进行极有限的定式化以之为科学奠定基础。正因为如此除了哲学家外还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加入研究行列，系统地介绍和研究石里克、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以及怀特海等人的思想。《科学时代的哲学》（共3卷，1964）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的纪念丰碑。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分析哲学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展开语言论研究，也就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后为轴心的语用论的分析哲学。并且分析哲学与实存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渗透，开始作为现代“哲学”拥有思想吸引力。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派学者也从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加强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由此进而扩大到对整个文化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实存主义哲学研究在前期译介的基础上，有了明显进展与深化，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思想研究有所深入，特别是尼采、雅斯贝尔斯、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的研究，颇具日本特色。二是把实存主义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并运用实存主义观点阐释各学科中的问题。三是从实存主义立场出发，展开创造性的探索，以图建

构日本型实存主义哲学体系。

3. 第三个时期。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且多有独创性理论问世。

哲学位居百科之首，其至难程度令人生畏，其至高境界又令人憧憬。战后日本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通过不断的自我思索，在向哲学这一至难至高的学问攀登的过程中，完成了一种独创性的伟业。你若没有基于想要说明世界与人的终极目的的热情与愿望，那么在哲学上就不会做出任何贡献，在哲学史上也不会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一视角看，首先跃入我们视野的是广松涉的哲学业绩。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基础，在这一时期正在建构“广松哲学”体系，《存在与意义》（第1卷，1982；第2卷，1993）是其一系列研究的集大成。广松通过大胆导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一面重新探索近代哲学的构式，一面以物化论为中心推进马克思研究。至80年代末，广松哲学体系初见端倪。简单说来，广松哲学在本体论上以“事的世界观”取代“物的世界观”，在认识论上则以“四支结构”的范式取代“主观—客观”的定式。通过这种转型以“超越近代”实现世界观的彻底更新。另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花田圭介的霍布斯研究、竹内良知的斯宾诺莎研究、平林康之的怀特海研究，也都各有特色。

其次中村雄二郎的《共通感觉论》（1979）开拓了知识论的新视野，其独创性受到高度评价，以共通感觉论为核心的“中村哲学”亦获定评。中村认为人的情念与感情有社会性，尤与制度相关，于是他从哲学上考察制度问题，提出语言是情念与制度的媒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发下，他从考察戏剧问题中发现“共通感觉”这个课题，认为所谓共通感觉，就是贯通并综合五种感觉的本源性感觉。中村重提这个问题，旨在批判近代只重视五感中视觉的观点，以恢复共通感觉。从共通感觉论出发，他又深入考察了“情感的知识”和“戏剧的知识”以及西田几多郎的哲学

问题，并从现代思想的视角，重新解构西田哲学，由此探索当代日本哲学发展的道路。

还有，知名哲学家中村元、山崎正一、井筒俊彦力图超越东西方哲学的界限，重构世界哲学。中村通过对东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认为尽管各种哲学由于不同文化传统而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各种哲学乃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但仍然可以促成世界哲学的形成。中村建议采用一种“并用方法”，把握“公平与包容性”的原则，以打破语言与思维方式界限，建立超越东西对立的统一的世界哲学。山崎正一提出以体系的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来建构哲学思想体系；他把哲学发展史与社会文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人们从西欧中心主义的哲学史观中解放出来并基于哲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探求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井筒俊彦在《意识和本质》和《有序与非有序》等著作中，提出了“东方哲学共时性的结构化”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在研究东方哲学时，要把自己的对象理解为某种共时性的结构，即当进行这种人工的、理论上的操作时，至少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就是把自己的对象看成一种共时性结构。简言之，就是把东方的各主要哲学传统，从现在的时点移向一个理念的平面，在空间上加以重新处理，即不考虑时间的座标，把东方哲学的诸传统处理为类型论式的，从而试图人工地创造出一个包容一切的结构性的思想联系的空间。

此外，大江精一的价值哲学、铃木亨的响存哲学、坂本百大的新人类机械论、伊藤胜彦的爱的哲学、伊东俊太郎的历史哲学与比较文明论、宇都宫芳明的人格论、市川浩的身体论、宇波彰的客体论、坂部惠的解释学、滨井修的社会哲学、中田光雄的文化论、伊藤重行的系统哲学、佐藤康邦的目的论，都是富有见地的研究业绩。

从哲学诸分支学科看 在美学领域 大西克礼、竹内敏雄、今

道友信都致力于哲学美学研究，形成了独自的美学体系；川野洋独辟蹊径以信息论和控制论为方法把计算机引入美学研究建构了由计算机艺术实验所支撑的科学的美学理论即“计算美学”。另外，西田正好的日本美学史研究，今道友信的东方美学史研究也独具特色。在伦理学领域，和辻哲郎跨越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建构了日本型人学伦理学体系金子武藏从实存主义立场出发试图把和辻伦理学中的“人伦”原理与西方伦理相结合而探求二者的统一；加藤尚武的生命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拓了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岩崎武雄、小仓吉祥也在伦理学理论探究中取得颇多成果。在科学技术数学领域，武谷三男提出的“三阶段论”、坂田昌一创立的“扳的模”、肇野芳郎的技术论，在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对。此外，田道振太郎、丸山兴辉，斋藤优的技术哲学论成为近 20 年来这一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提及的还有上边春平、梅原猛、行内芳郎的文化学研究，田边元、西谷启治的宗教哲学研究等。

五、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特征

回顾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哲学思想发展大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仍然是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尽管日本哲学界也曾认识到依存于西方的非独立性是近代日本哲学的一大弱点，可是，由于作为“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在日本之产生、形成与发展，一直同西方哲学密不可分；并且，因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依赖于西方且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之一员，其思想也必然与西方难解难分。因此，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是战后日本哲学整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战后日本的西方哲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化了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二是不断

导入西方最新哲学流派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就西方哲学史研究而言，日本可谓跻身世界前列。

在日本学者看来，研究西方古典理论即使少有创见，但与水平不高的独立研究相比较，其学术价值更高。因此，专事西方哲学研究者在日本哲学界占居绝大多数，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譬如井上忠的希腊哲学研究，山田晶的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都达到国际水平。至于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战前已有深厚基础，战后则呈百花齐放的局面，不仅在关于康德、黑格尔、笛卡儿这些哲学大师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而且对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左派的研究也有明显进展。这些研究大多以忠实理解原典为目的，却也有采取训诂注释的姿态，旨在借助于重新解构赋予所研究对象以现代意义。

在引进西方现代哲学流派方面，伴随战后初期美国的占领，整个西方文化追随“美国化”接踵涌入日本，实存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以及现代西方各种社会理论无不到日本寻找立足之地。可是，在与日本思想发生碰撞之后，有的似昙花一现，旋即消失；有的则扎根东土，融入日本思想之中。之所以如此，固然与日本社会及国民的抉择有关，却也不能忽视思想家的作用。日本学术界面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潮，非但不加拒斥，反而积极捕捉，主动引进。在引进过程中，他们十分重视基础作业，即不是停留在依据二手资料的介绍上，而是扎扎实实地翻译西方现代哲学各流派代表性哲学家的原著，然后注释原著，阐明其思想理论。这样，既为国民的抉择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又为哲学家的创造性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料。可以说，战后日本对于西方哲学的引进与研究，是日本哲学走向独立性的前提与基础。

第二，重视研究并重新评价日本哲学思想，是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又一特征。

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特征之一，是人们比战前更加关心日本

哲学史乃至一般思想史，其研究也更加活跃了。总括看来，战后的日本哲学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立足于现时代，重新认识日本的思想，二是吸取现代哲学的成果，重新构筑日本的思想。

如上所述，战后初期日本学术界以追究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为契机，对以往日本学术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自然唤起人们对于日本哲学史、思想史的关注。起初，人们大多从近代主义、西洋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同西方比较，反省日本现代化的落后和失误。不久，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哲学思想界便开始关注民族主体性问题，重视使外来思想日本化并丰富其内容。进入 60 年代，尤其是 70 年代以后，日本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文明”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不断暴露，日本社会问题频出，人们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并采取种种形式对之反省。这时，在哲学界，也从世界哲学史的角度重新研究东方及日本的传统精神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正如汤浅泰雄所说，近代日本哲学与近代以前的日本乃至东方的思想史传统并不是完全被割断的，作为日本人的思想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从现代的视角重新反思日本思想，并非要以东洋主义、传统主义取代西洋主义、近代主义，而是为了达到“通过传统而超越传统，创造出真正的世界水平的哲学”的目标。

基于上述认识，在重新考察日本哲学史，研究各种传统思想的特质和意义的时候，论者的审视角度和判断标准有了明显变化，这就是吸取现代哲学的新成果并以之解释和重构日本的思想。在战后第一、二时期，丸山真男、上山春平、梅原猛是日本思想论的代表。丸山认为，日本思想的特质在于“缺乏精神支柱”。梅原通过对日本美学和宗教的探求，欲在传统的美感和佛教思想中重新发掘已经丧失的精神支柱。上山从现代文明论的视角考察日本近代思想后，提出“凹”型思想论，认为日本犹如处于人类文明的谷底一样，一切文明都流入这里，而日本却没有独自的文明。到

了战后第三时期，立足现代思想反思日本哲学史的趋势更加明显。以西田哲学研究为例，竹内良知在战后初期曾批判西田哲学，可到了 70 年代末，他在认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之后，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观，重新探讨和评价了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中村雄二郎运用解释学的“解构”的方法，以现代思想与西田哲学的关系为线索，把西田哲学分解，探求其中每一个命题的现代意义，然后又把它重新组合起来，以揭示西田哲学新的价值与意义。中村认为，若不如此认真解析西田哲学，就不可能诞生日本的新哲学。因此，以现代哲学的成果重新认识日本哲学史，其目的亦在于摸索“通过传统而超越传统”的道路。

可以说，战后日本哲学史研究的进展，其自身就是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重要一翼。

第三，哲学研究多样化、多极化，也是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特征之一。

日本哲学史家船山信一曾说过，日本哲学界是世界哲学的博览会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战后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化而带来学术研究的自由化之外，还为现代日本人的多维价值观所决定。日本人无论是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还是思想文化，一般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取过来之后再加以消化、改造，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哲学界也如此，有人说，在日本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思想，这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也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哲学发展的状况。尤其是 70 年代以后，哲学失去了确定的主流和中心，更加趋于分散化。也就是说，此前明显对立的派别由于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而界限模糊了。与之同时出现的另一现象是，哲学自身界限的模糊化。即是说，现今的哲学已经突破传统哲学意义的框架，而向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渗透，尤其是与人、与环境、与文化结合得更为紧密了。另外，现实世界也为日本哲学研究提出了极其繁多的课题，与此相适应

的哲学研究的方法也必然是多样化、多极化的。特别是把电子计算机引入哲学研究之中，有可能导致人文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总之，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失去权威，诸学科分化愈来愈细的今日之日本，哲学家们以自觉的时代意识，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正在自主地探索日本哲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上篇

战后日本哲学主要流派